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忠实 ——机构翻译视角

张峻峰, 庞影平

摘 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自面世以来, 国际销量可观, 影响深远。但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部分内容的英译似乎显得不那么忠实。因此, 本文梳理外宣翻译中的忠实概念, 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实例, 探讨忠实的必要性、相对性、多维性和恒定性, 阐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忠实特点。结合国内外机构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们发现采用机构翻译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成功英译的忠实属性, 既可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过程中体现出的归化趋势提供理论阐释, 也为新时代构建融通中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背景下我国机构翻译的实践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忠实; 归化; 机构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2)05-0148-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2.05.003

一、引 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下文简称《理政》)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等多语种于 2014 年 10 月向全球出版发行。《理政》第一、第二和第三卷已有 33 个语言版本, 在全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 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1]。《理政》的英译版本由中国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及外交部等部门的中方译员及母语为英语的语言专家集体精心打造而成, 具有官方翻译的性质。由官方组织的对外翻译, 在我国有诸如外宣翻译和国家翻译实践等称谓。其中, 外宣翻译的使用最为广泛。外宣翻译的操作和评估, 国内学界曾经提出过“硬译”“讲政治”“政治等效”及“三贴近”等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均将忠实奉为圭臬。比对《理政》英译文本呈现出的新特点, 这些原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理政》英译的成功, 部分译文还与上述评估原则有相悖之嫌, 显得不那么忠实。

笔者认为, 借助机构翻译的理论框架,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外宣翻译的忠实。机构翻译的官方规约性可以用来解释外宣翻译中忠实的动态性和恒定性, 逻辑如下: 不同历史时期的忠实内涵, 是在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上因时、因势而定, 具有动态性; 机构翻译忠实的对象是恒定的, 即忠实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总目标; 在文本构建和翻译重构策略选择层面, 忠实的具体对象是当时当地官方管理机构制定的规约。此外, 机构翻译的代言性、集体性和靶向性可以帮助我们历时梳理机构翻译研究相关成果, 有理有据地解释《理政》英译程序的新设举措和英译文本的归化倾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话语英译研究”(18BYY026)

作者简介: 张峻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zjfeng@cug.edu.cn(湖北 武汉 430074); 庞影平,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9)

向,为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从“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

二、外宣翻译中的忠实

要总结提炼《理政》英译的成功经验,需要适用的评估原则来考察《理政》英译过程和英译文本特点。依其功能定位,《理政》的英译应归为外宣翻译。外宣翻译就是将与中国相关的信息翻译成外文,通过纸质媒体、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载体对外发表传播^[2]。据此定义,外宣翻译包括学界提到的政治文献翻译^[3]以及相对笼统的对外翻译^[4]。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过“硬译”“讲政治”“政治等效”以及“三贴近”等观点。这些观点要么来源于权威的政策指示,要么生发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总结。虽然某些观点存在争议,但忠实是一致推崇的指导原则。

我国的外宣翻译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毛选外译,中央高度重视,具有政治任务的属性^[5]。毛泽东主席鼓励翻译工作者积极做好翻译工作,将外译工作的定位提升到党的“理论工作”的高度^[6]。既然是党的理论工作,那么准确传达我党的主张就是必然要求。毛主席指出,理论著作的外译,“‘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惑,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6]。毛选译者张仲实对此的解读是,理论的外译,应该遵循“硬译”的原则,在“信”和“顺”无法两全时,以译者理解的“信”为准^[6]。在翻译方法上,“硬译”以重视直译为特征,在翻译策略上,“硬译”体现的是异化的策略选择。多年来,理论书文外译的承担单位中央编译局一直采用异化策略,多用直译方法^[4],其目的,应是再现我国理论思想中的原创性和权威性。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忠实于原文作者和思想,将具有异域色彩的文本带给读者。

“讲政治”也是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指导原则。前外交部资深翻译家程镇球阐述了“讲政治”的内涵。“讲政治”共有四条要求,“首先要在政治上忠实于原文”,外译时,要“紧扣原文”“不能任意删字,当然也不能任意加字,或者离开原文自由发挥”,同时,需要注意原文的词序,“不要轻易颠倒,避免犯政治性错误”^[3]。其次,如外译需要参考外媒相关内容,词汇的选用要留心“词义的政治含义和影响”。再次,外译工作者需要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政策意识,在吃透原文精神的前提下,达到“讲政治”的第四个要求——掌握好用词的分寸。即使“讲政治”的表达形式在英文中并不常见,也要形成惯例,坚持使用^[7]。“讲政治”强调的忠实是在透彻理解原文政治信息的基础上,忠实于政治信息的准确、完整传递。译文的可读性、接受性在翻译操作考量中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说“硬译”和“讲政治”的指导原则是以原文中(政治)信息的无损传递为外译标准,那么“政治等效”和“三贴近”则是以译文表达习惯为依归,以译文读者的接受度为首要考量。“政治等效”原则是“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和交际功能”^[8]。新华社对外部英文专家、译审王平兴认为“政治等效”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外译时,要追求的是再创对应信息;“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和“政治等效”的提法在逻辑上有瑕疵,不切实际^[9]。同样以译文读者接受度为考量标准的指导原则还有黄友义提出的“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2]。根据此原则,外译时不仅要做到传统的信、达、雅,还需考虑受众思维习惯,切忌机械逐字直译,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加工”,处理原文信息时,有时要直译,有时则需采用间接转述的方式。

上述四个外宣翻译指导原则均强调忠实。“硬译”和“讲政治”是从信息发出者的角度出发,以原汁原味对外传播(政治、理论)主张为外译忠实的要义,属于异化翻译策略下的“硬”宣传;“政治等效”和“三贴近”则以对外传播的效果作为导向,让译文阅读顺畅,让信息易于理解,让

接受顺理成章,属于归化翻译策略下的“广”传播。按照时间发展脉络,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经历了从原文中心到读者中心,从注重宣讲到注重接受,从单语角度强调政治正确到从跨文化角度追求更高级别的政治、文化认同的三大转变。

翻译实践中不存在采用绝对的归化或异化策略的情况。上述四个翻译原则中,“硬译”和“讲政治”异化倾向明显,“政治等效”和“三贴近”则有强烈的归化意味。实际外译操作时,如何平衡异化和归化策略,更重要的是,如何达到忠实呢?外交部翻译室专家陈明明的看法颇有参考意义:“翻译能改变的非常少,能做的只是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做一些技术上的表述,消除一些障碍。在余地不大的情况下,在忠实原文不漏不减的情况下,尽可能用准确的英文表述,加强外国人的接受度;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让外国人对我们党政文件的表述完全满意并接受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10]

三、《理政》译例分析的疑难点:忠实的必要性、相对性、多维性与恒定性

陈明明先生的观察说明:要忠实原文,不漏不减;在此基础上,翻译文本构建时可考虑采用一些技术手段润色,提升译文接受度;并且译文在国外受众中取得完全接受是不可能的。将陈明明的具体操作建议用于《理政》英译的实例分析时,却存在一些疑难之处。表1是《理政》第一卷的十八个专题名及其英译文的列表。分析表明,这些专题名的英译,不仅存在又漏又减的情况,还有增加原文中未提及的信息成分的现象。表1中译例的处理方式,与异化策略指导下的“宁信而不顺”“不可任意增删、自由发挥”的指导原则不符,也与归化策略指导下的“忠实原文、不漏不减”要求相悖。译例分析表明,现有的忠实概念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理政》英译操作的文本现象。《理政》英译实践与现有忠实指导原则间的落差错位表明:作为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忠实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不一,用于评估《理政》英译实践时捉襟见肘,效果不理想。那么,《理政》的英译忠实吗?笔者认为,《理政》的英译是忠实的,下面分别从忠实标准的必要性、忠实原则的相对性、忠实内容的多维性和忠实对象的恒定性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忠实标准的必要性。对译作的评判,英文中最常用的术语仍然是 *faithfulness* 或 *fidelity*^{[11](P57)},亦即译界常用的信或忠实。王东风对忠实进行了解构,提出绝对忠实只存在于伦理层面,实际操作层面,译作只能做到“近真”^[12]。王向远认为,忠实“是翻译中的理想主义”,也是必不可少的翻译实践指导;只有坚持忠实,才能在翻译实践中“提倡理想,规制现实”^[13]。若无忠实这个伦理性的标准作为指导原则,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都会迷失方向^[14]。

其次,忠实原则的相对性。忠实是个具有多义性和相对性的概念^[15]。多义性表现在译文可以忠实于原文形式、内容、写作风格、功能效果、意图等;相对性指的是忠实不可能在实践中面面俱到,译文在某方面的忠实很可能是以其他方面的不忠实为代价。异化或归化策略的选择,或者说在“信”还是“顺”上的倾向,其实就是忠实原则相对性在翻译策略上的体现。不同策略指导下采用的翻译方法,如直译、省译和增译等可以理解为译文信息重构时对原文信息成分的取舍和强调手段,是忠实原则相对性在译文语言资源配置时的体现。

再次,忠实内容的多维性。外宣翻译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忠实标准非常严格^[3],需严格遵循“忠实原文,不擅自解读”原则^[16],做到原文信息不漏不减。黄友义^[2]提出的“三贴近”原则,更多地关注异域读者的需求,关注信息在目标语读者中的接受,翻译时,要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注意过滤对内传播的内容,在对外阐释过程中做到内外有别^[17]。上述讨论涉及译者和外宣效果两个方面。从译者角度来看,外宣翻译的政治性决定了译者对原文信息的处理,并没有太大的变通余

表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十八个专题名及其英译

中文专题名称	英译文	原文、译文比较与解析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坚持和发展”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The Chinese Dream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实现”和“伟大复兴”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形容词和名词。
三、全面深化改革	All-round and Deeper-level Reform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译文中未见信息成分省译现象, 但增加了名词“-level”与“deeper”构成合成词, 增译了“层面”的信息成分。增译名词, 显性体现改革的层面。
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促进”和“持续健康”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形容词。
五、建设法治中国	Rule of Law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建设”和“中国”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Culturally Advanced China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形容词。原文中的“强国”在译文中显性增译为“China”。增译名词。
七、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	Social Undertakings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推进”和“改革发展”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八、建设生态文明	Ecological Progress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建设”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原文的“文明”有字典意义上的对应词(civilization), 但译文中将其增译为“改善(Progress)”显性体现了生态文明的向好发展态势。增译名词。
九、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National Defense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推进”和“军队现代化”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十、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丰富”、“实践”、“推进”和“祖国统一”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此处的“统一”, 也可看作形容词)。
十一、走和平发展道路	Peaceful Development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走”和“道路”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十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推动”和“构建”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
十三、做好周边外交工作	Neighborhood Diplomacy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做好”和“工作”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此处的diplomacy也可看作是体现了原文中“外交工作”的涵义)。
十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加强”和“团结”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团结”在原文语境中, 也可视为形容词或动词)。
十五、积极参与多边事务	Multilateral Relations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积极”和“参与”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副词和动词。
十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	Close Ties with the People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党”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名词。
十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Combat Corruption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动词词组。原文中的“建设”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名词。“反腐倡廉”的动作意味, 在译文中以动词“战斗和斗争(combat)”表达, 显性表现了斗争的艰巨性和中央的重视。增译动词。
十八、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The CPC Leadership	原文为动词小句, 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提高”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

注: 表中使用黑体标示的信息成分, 在“中文专题名称”栏的, 表示该信息成分在英译文中省译; 在“英译文”栏的, 表示该信息成分在英译文中增译。

地,应努力保持忠实;从外宣效果来说,以译文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信息,达致理解和共情,也是忠实的应有之义。

最后,忠实对象的恒定性。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外宣翻译的忠实内涵不尽相同,但这些观点源于当时、当地的对外宣传需要,囿于当时、当地对翻译文本创建手段的认知,服务于对外展示国家形象的意图。外宣翻译忠实观的发展脉络表明,实现忠实的文本手段有历时变化,具有不恒定的特点,但这些观点背后,忠实的对象是恒定的——通过文本手段最大化国家利益,即通过动态改进外译指导策略,持续完善翻译操作方法,达到优化呈现国家形象的目的。

从传播效果来看,《理政》的成功英译是忠实的。但是,外宣翻译的忠实在翻译策略选择上,有从异化到归化的历时变化倾向,能否引入某个概念框架来解释这种变化呢?笔者认为,将《理政》的英译纳入机构翻译的框架考察,可为外宣翻译忠实观的动态变化提供思路,也为《理政》英译过程中的程序设计和策略选用分析建立理论基础,以阐明学理,规制实践。

四、机构翻译的属性:忠实于官方规约

《理政》的英译属于官方组织的翻译活动。人类历史上,官方组织的翻译活动自古有之。既有引入型的翻译,如唐代的佛经翻译;也有政府设立,面向国内多语族群,就社会事务、国家政策等开展的翻译,如加拿大的联邦翻译局^{[18][19][20]}从事的翻译活动;还有国际组织内部的常设翻译机构开展的翻译实务,如欧盟委员会翻译服务处为欧盟多个委员会和理事会提供的翻译服务^[21]。这些翻译活动都由官方组织进行,有具体的管理和翻译机构,秉承一定的翻译原则,体现官方意志。

官方组织的翻译活动,也存在组织方虽为官方机构,但并不是国家机构的情况,如上文提到的欧盟委员会翻译服务处。曾为该服务处译员的 Koskinen 提出了相对宽泛(因而也更具包含性)的“机构翻译”定义^{[22](P22)}:“我们将官方实体(如政府部门、跨国组织、以官方身份行事的私营公司或个人等)以翻译为媒,向特定受众“言说”的情形,视为机构翻译。”^①据此定义,《理政》的英译个案以及更抽象层面的外宣翻译,均具机构翻译属性。

翻译机构的官方属性是一个渐变体。Koskinen 认为渐变体的一端是非常正式、有特定任务的机构,远端是文学类书籍的出版社,因为文学类译著传达给读者的是原作者(而非机构)的声音^[22]。Mossop 对翻译机构官方性质给出的判断标准是:当(读者认为)译文由机构提供或原文作者为机构成员时,此类译文就是在为机构表情达意,视为机构翻译^[19]。翻译机构官方属性的渐变特点实际上反映的是机构翻译的特定产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官方意志,或者说该翻译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机构的制约。并不是所有机构参与的翻译都能称之为机构翻译,只有在渐变体中官方性质最强的机构开展的,受机构制约,代表官方意志的翻译,才是机构翻译^{[23](P57)}。机构翻译判断标准的讨论表明,官方规约性是机构翻译的共性。

在官方规约指导下,机构决定翻译的环节和细节,其产品看似为执行翻译的机构发声,实则替管理机构的官方代言,具有代言性。机构翻译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为特定受众服务。Mossop^[18]和 Koskinen^[23]都认为,机构是翻译中的主导者和施动者,通过为特定读者翻译,从而为特定人群服务。机构的这个特点,在翻译文本上也有体现^[24]。Keller 认为机构产出的文本具稳定性,与赋予机构的使命和任务有关,具有集体性,是用目标人群能理解的方式来创建想要传递的事务、思想和

① we are dealing with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in those cases when an official body (government agency,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 or a private company, etc.; also an individual pers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status) uses translation as a means of “speaking” to a particular audience. 作者译。

概念^[25](P73-74)。机构翻译采用的语言形式是载体和手段,服务于创建目的,具有靶向性。

机构翻译的官方规约共性可用来解释外宣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忠实内涵差异以及生发于这些差异的指导原则。外宣翻译忠实的恒定对象,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宣翻译的管理部门依据指示形成官方规约,制定外译目标。根据目标,翻译机构确定翻译策略倾向,采用具体的翻译方法,将官方规约转化为具体动态的忠实内容,用文本手段在外译中创建预期的传播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历史时期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都是忠实的。循着机构翻译的共性,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阐明坚持外宣翻译忠实指导原则的理据,理顺外宣翻译忠实的恒定对象和忠实的动态内容之间的关系,在实践方法上依官方规约,打破传统译论的桎梏,在语言形式层面进行译文意义配置时,不拘泥于直译、意译之争,均衡考虑信息准确、完整传递与读者接受效果。

五、《理政》英译的特点:归化导向的忠实

《理政》英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和总结表明《理政》的英译有特定指导思想、翻译原则,也有特定新设的评估和审核程序,机构制约因素突出^①。制约因素中,《理政》英译的传播目的和读者定位及其对翻译过程和译文构建的影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这些重点制约因素的厘定生发于机构翻译具有的代言、集体和靶向的共性。分析、挖掘《理政》英译的特点,可以从这些重点制约因素的考察入手,为《理政》的忠实英译提供理论支撑和后续实践参考。

(一) 融通中外传播导向,普通域外读者定位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6]。中央编译局资深翻译、《求是》英文版定稿人贾毓玲认为需要建立“以融通中外为导向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以利于“政治话语重建与创新,会极大提高外宣文本的可译度,提升外宣翻译工作的可操作性,减少外宣翻译由于文本的内宣特色太浓而面临的巨大挑战”^[17]。贾毓玲的感言说明:长期以来,外宣翻译的原文创建时,内宣特色鲜明,造成翻译操作困难;建立新时代融通中外的话语传播体系,有利于外宣翻译可译度的提升,也有利于外宣翻译传播效果的提升。就翻译的准确度而言,参与外宣翻译的中方专家多为资深翻译,且有大量外国专家把关,不会存在错译的情况,但存在因“硬译”而导致的译文生硬、国外读者接受度欠佳的问题。

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意味着从顶层设计层面拓展了外宣翻译的意义重构操作空间。整体而言,内宣和外宣受众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内外有别,传播目的不同,阅读习惯和偏好也不一样。理想状态是,如果能在内宣的同时,在文本构建模式和行文方式上兼顾到外宣的需要,那么原文本造成的外译困难就会得以消减。陈明明认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在实际操作层面,要结合新时代传播目的,以读者需要和读者阅读习惯为导向,厘定翻译策略,在充分考量中、英双语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差异的基础上,少用直译和拼音,多从现代英语中有甄别地选用“有用的词汇”^[10]。陈明明先生提到的这些翻译方法,对于翻译实践,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理政》中文版部分章节涉及党政文件的内容,英译的过程中,不仅采纳了上述指导意见,在精准定位域外读者方面,更是首次提出要以普罗大众,而非以前外译面向的“中国通”式的专家读者为受众对象。参与英译的黄友义先生就明确谈到《理政》英译的清晰读者定位:“我们这次翻译

^① 《理政》英译本已出三卷。现有文献中,英译专家的经验总结基于第一、二卷的英译。截止到2022年7月5日,尚未见基于第三卷英译的回顾和总结。

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读者对象属于比较大众的,要让国外普通老百姓能够看懂。”^[27]从机构翻译官方制约因素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将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视为新时代最具根本性的官方制约型指导意见,那么域外普通读者的受众定位,则为《理政》的英译提示了具有官方制约性的机构翻译团队工作模式和英译策略指南:三轮中外专家译校,归化翻译追求实效。

(二) 双语团队专业译校,读者接受贯穿实操

中外译员合作的模式在我国官方翻译机构中由来已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母语为目的语的外来专家参与我国外宣机构翻译实践的情况就并不鲜见。一般情况下,正式出版的译文先由国内译员执笔,经外来专家润色后再交由国内译员定稿^[28]。随着合作的稳固和深入,有些外来专家已经成为了翻译机构的“干部”,如外文出版社的沙博理先生^[29]。新时代背景下的外宣翻译也一直在延续中外合作的模式,并拓展到引入目标语国家的相关机构参与译文的斟酌。例如,中国外文局和英国文化委员会有定期会议机制,共同探讨政治词汇的英译问题^[10]。与目的语国家专家及机构的合作,从译员团队构成上为译文的阅读体验和传播实效提供了参考和保障。

《理政》的英译,也采用了中外专家团队合作的模式。据徐明强先生介绍^[27],整个外译团队共有100多人集中开展工作。中方译员完成初稿后,交由外来专家进行修改和润色,再交还给译员,如有问题,译员和外来专家进行讨论后定出初稿。初稿完成后,根据《理政》原文本中涉及的不同话题,邀请各参与机构中熟悉该话题的中方双语专家加入译员队伍,负责各相关部分的定稿。完成定稿排版后,再由定稿人通读译校。此后,《理政》英译团队启用了新设的集体通读程序:全体定稿专家齐聚翻译室,将文档投屏,集体逐句通读,如有问题,现场修改润色。

逐句通读时,排版的定稿业已经过了中方译员初译—外来专家译校—中方译员定稿—中方专家审校四个程序,是二审的定稿。一审保证了源语意义在译语中重构表达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二审确认了译语表达的政治性和专业性。专家的现场集体通读,实际上是在做三审。在逐句译校的过程中,三审解决的是译语表达的通顺可读性问题。三审定稿的英译本具有以下特点^[27]:(1)篇章译名及封面设计均采用简明原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谈”字,英译时并未纠缠于是用英文介词“on”还是稍显不正式的动词词组“talk about”,而是参照英国前首相 James Wilson 写的 *The Governance of Britain*,将《理政》英文篇名定为 *The Governance of China*,下接习近平的拼音作为作者署名。书名英译时省略了“谈”字,但却清晰传达了中文篇名蕴含的意义。《理政》中英文版封面均采用纯淡黄底色,简洁明快。(2)特色称谓及政治概念均采用意译原则。避免直译中国特色政治词汇,必要时加背景注释,如文中出现的“知青”一词,在文中进行了解释性描述和增译。(3)文化特质及成语表达均采用释疑原则。中文四字格和成语,尽量使用英文相应表达,如“爱屋及乌”译为“love me, love my dog”。无相应英文表达时,要在考虑译文政治影响前提下加注。如“凿壁偷光”的英译就要考虑其概念意义在英文中的转达是否会引起诸如中国人喜欢窥探他人隐私等误解。(4)遣词造句及意义配置均采用顺应原则。句中多用“小词”,动词后接介词,注重句中词语搭配和通顺性,如以 do a good job of 来译“我们努力完成…”;原文中很多形容词及副词省略;译文句子较原文短,多用名词短语译原文动宾结构,句式符合英文阅读习惯。

谭载喜等在介绍归化翻译策略时,对该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阐述如下^{[30](P14)}:“精心选择有助于以这种方法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用流畅、顺耳的译入语风格;改变目标文本以符合目标话语类型;添加解释性材料;删除源语独有特征以及以译入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目标文本变得总体和谐”。

比对上述介绍,《理政》英译团队采用的工作程序、工作模式和翻译方法,是归化翻译助力传播的典型范例,更是在翻译人员调配、翻译流程设计和翻译策略选择上忠实于“创建融通中外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这个新时代机构翻译官方规约的成功案例。因此,《理政》的英译是归化导向下的忠实英译。

六、结语:《理政》英译体现的趋势与启示

本文从《理政》英译的译例分析入手,提出了外宣翻译中坚持忠实标准的必要性,探讨了忠实原则的相对性、忠实内容的多维性和忠实对象的恒定性,论证了新时代翻译工作从引入介绍型的“翻译世界”到输出阐释型的“翻译中国”背景下,《理政》英译采用归化策略的忠实性。

《理政》的英译具有代言、集体和靶向等机构翻译的共性特点。机构翻译的官方制约性在《理政》英译的过程中体现为以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根本指导原则,以真实全面对外传播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成就的实效为导向,以异域普通读者为受众目标,在翻译团队及专家成员的选用方面有新变化——坚持中外专家合作模式,根据不同话题,纳入中方专业领域双语专家进行二审;在译校流程和定稿环节方面有新举措——在保证二审定稿译文信息重构正确完整、无意识形态和专业知识瑕疵的前提下,新设了最终定稿前的集体投屏通读润修环节,力求译文符合普通读者阅读习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有新特点——新增的中方专业领域双语专家二审及新设的集体投屏通读三审环节,体现的是英译时对译文专业权威性和英文读者顺畅阅读体验的策略考量。

《理政》的英译采用了归化策略。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通过避免直译误解、增加注释说明、删减冗余信息、改变信息流向和采用平实风格等手段来减少异域读者阅读障碍,是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来创造能指,引起共鸣,达成传播效果。语言形式的使用是手段,表情达意时,不是单纯追求用英文的能指传递中文原文中的某个所指,而是为了在异域读者中重构(有时是创建)中文中的所指,让这类所指在语言配置上易于接受、在阅读体验上乐于接受,在共情达意上广为接受。

随着我国硬、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新时代外宣翻译的一大任务无疑是要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受众也就从以前比较小众的“中国通”式的专家读者变为普罗大众。目标读者群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原文本建构模式上从国内宣传为主向融通中外导向转变,在思想认识上从传统的文本翻译向专业的双语写作转变。这两个转变,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要求内宣文本创作团队提升公共外交意识,在文本创建的模式和语言使用的范式两方面考虑国际传播的需要;从翻译学的角度考察,要求外译专家团队多用归化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的环节和译文接受的评估两方面考虑实际传播的效果。因此,建立统一的国家级翻译管理部门,动态跟踪厘定对外传播需求,协调原文创建,完善并贯彻行之有效的译文重构流程、译员选用机制和适用翻译方法,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 [1] 央广网. 17 国出版机构与我签署备忘录 共同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EB/OL]. http://china.cnr.cn/news/20210303/t20210303_525425916.shtml, 2022-03-25.
- [2]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 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 2004(6).
- [3] 程镇球. 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 中国翻译, 2003(3).
- [4] 滕梅, 吴菲菲. 国家翻译机构对翻译活动的规范——以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为例[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 [5] 尹承东. 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谈建国以来的中译外工作[J]. 中国翻译, 2009(5).
- [6] 张仲实. 毛泽东同志理论著作翻译[J]. 中国翻译, 1980(1).
- [7] 程镇球. 政治文献的翻译[J]. 中国翻译, 2004(1).
- [8] 杨明星. 中国外交新词对外翻译的原则与策略[J]. 中国翻译, 2014(3).
- [9] 王平兴. “政治等效”翻译: 臆想还是现实? [J]. 中国翻译, 2016(1).
- [10] 陈明明. 在党政文件翻译中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J]. 中国翻译, 2014(3).

- [11] Shuttleworth, M., M. Cowie. 翻译学词典[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12]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 中国翻译, 2004(6).
- [13] 王向远.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 ——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J]. 广东社会科学, 2014(3).
- [14] 曹明伦. 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兼论严复的“信达雅”[J]. 中国翻译, 2006(4).
- [15] 谭载喜. 翻译与翻译原型[J]. 中国翻译, 2011(4).
- [16] 严文斌. “趣”说政治话语对外传播[J]. 中国翻译, 2015(5).
- [17] 贾毓玲. 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求是》英译体会[J]. 中国翻译, 2015(5).
- [18] Mossop, B. 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A missing factor in translation theory[J]. *TTR*, 1988(2).
- [19] Mossop, B. 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and ‘idiomatic’ translation[J]. *Meta*, 1990(2).
- [20] Mossop, B. From culture to business. Federal government translation in Canada[J]. *The Translator*, 2006(1).
- [21] Koskinen, K. Institutional illusions: Translating in the EU commission[J]. *The Translator*, 2000(1).
- [22] Koskinen, K. *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EU Translation*[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8.
- [23] Koskinen, K.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A]. Y. Gambier, L. van Doorslaer(Eds.).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1.
- [24] Bal, M.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3rd edition)[M].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5] Keller, K., M. Foucault: Discourse, power/knowledge and the modern subject[A]. R. Wodak, B. Forchtner(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C].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26]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2022-03-25.
- [27] 尹佳. 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黄友义、徐明强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6(5).
- [28] 黄友义. 把好编辑和翻译两道关 不断提高外宣品的质量(二)[J]. 对外大传播, 2000(Z1).
- [29] 任东升. 从国家叙事视角看沙博理的翻译行为[J]. 外语研究, 2017(2).
- [30] 谭载喜, 邵璐. 概论[A]. 许钧, 穆雷. 翻译学概论[C].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Faithfulness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 An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ZHANG Jun-feng, PANG Ying-ping

Abstract: Since its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ease,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has been a success in terms of copies sold and influences exerted worldwide. However, some renderings seem to be “unfaithful”. Based on a review of faithfulness in Chinese publicity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elucidates its necessity, relativity,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constancy before confirming faithfulness as the hallmark of the renderings. It is argued that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could provide a better account of faithfulness found in the renderings of the translated work.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minent domestication trend showcased in discursively reconfiguring meaning in translating the volumes into English. The purpose of the examination is two-fol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account of the translatorial success, and to offer feasible policy options for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that is capable of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faithfulness; domestic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孙洁)